

# “一带一路”与大边防

◎ 侯昂好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新的时代中国新的国家追求，它呈现出强烈的内外大联通性、外向大进取性、陆海结合性三大特征，这就要求边海防具有新的理念、定位、能力、作用。

“一带一路”与大边防是中国新时期国家力量和智慧的体现。

**关键词：**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 大边防

**中图分类号：**E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1002-4484(2016)04-0020-05

**作者：**侯昂好，军事科学院国家边海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专业技术8级，上校

在世界历史上，大国必争，强国必霸，“修昔底德陷阱”时时出现。“一带一路”不是一种对抗的战略，而是一种合作的战略，是打破以邻为壑的战略。今天的世界到了中国承担与之能力、地位相应的责任的时刻，需要中国走出内敛式的自我发展，需要“大边防”跟上中国“走出去”的步骤。边防也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线式守卫，不再仅仅是兵戎相见，它是防卫和管控，也是建设和合作，是“一带一路”的支撑地和出发点，是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结合部，在新的挑战和机遇中，与“一带一路”共同焕发出新的活力。

## 一、内外大联通性与边海防的新理念、新能力

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能离开交流合作而孤立于世，世界上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活在有了交通和生产的交换之后，一切关系都在互相影响、互相感染、互相促进，“蝴蝶效应”是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一带一路”的内外大联通性体现了在新的时代中国新的国家追求，这就要求边海防有新理念、新能力。

### （一）大联通犹如命运共同体的动脉

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曾这样评说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丝绸成了连结不同民族的纽带，并出现了一条无穷无尽的商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结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汉朝以后，中国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往东，开始与朝鲜半岛、琉球、日本列岛交往；向西，则经由河西走廊开辟古丝绸之路，交往延伸到中亚、地中海；向南，交往不仅扩及整个东南亚，而且通向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东端最重要的大国，中国的国力消长始终与丝绸之路的兴衰息息相关。

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推动中国西部陆地开放发展为基轴，拓展向西部延伸的巨大区域空间，构建从中亚到欧洲的广阔开放合作经济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推动建立开放与合作的海上大通道和创建沿海国家间的经

济合作和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是基于地区、面向世界的大战略。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截至2015年4月,“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得到了沿线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已增至57个,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也已正式成立。“一带一路”走出去、引进来、广交朋友、深度合作的内外大联通性已然彰显。地缘和时代联系赋予中国构建周边互联互通网络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种网络犹如大动脉,给周边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以生命力和能动性。

(二)大联通与大边防打破以邻为壑、走出强而不霸的新路

“一带一路”的大联通性是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和新时代“亲、诚、惠、容”理念的体现,是东方战略智慧的延伸。内外大联通是构建基于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全方位链接,发展四通八达的基础设施网络(陆、海、空交通网络),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内外大联通有以下特性: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紧密联通,货物、资金、人员、规则大联通,国内发展与广大地区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紧密关联,安全的互动性增强,国内安全外溢效应越来越强,国际安全环境有越来越强的内渗效应,安全问题内外一体。

边防从来都是内外结合的敏感地带。近代,边疆分裂主义分子一般都要寻找国外势力作为靠山,内外勾结分裂国家。比如,当左宗棠指挥清军攻占北疆并打开通往南疆的门户、使阿古柏匪帮行将灭亡之时,英国政府公开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允许阿古柏继续占领喀什噶尔,作英国的“保护国”。清政府在左宗棠等人的强烈要求之下,坚持既定方针,终于将阿古柏匪帮全部逐出境外——这是成功的例子。辛亥革命前夕,哲布尊丹巴等为谋求外蒙独立,派遣杭达多尔济亲王赴俄进行活动,受到沙俄政府官员的公开接见,沙俄驻华公使还公然向清政府声

称蒙人已赴俄申诉冤情,清政府理当采取果断措施,制止蒙古王公通外国的行径,可惜清廷虑不及此,导致蒙古反动王公与沙俄的勾结愈加紧密,进而分裂中国——这是失败的例子。

(三)大边防是“一带一路”力量和智慧的投射点

“一带一路”的内外大联通性使得边防的内涵和外延扩大为“大边防”,是内外大联通的桥梁和舞台。由是,新的形势给边海防带来了机遇,也使之面临更多挑战。内外大联通意味着巨大的活力,但是,更大的活力往往也暗藏着更大、更不确定的安全威胁。如海上恐怖主义、陆上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水资源安全与环境安全等等。大联通在增强内外融合的同时,也给边海防的管控带来巨大的压力。如非传统安全在内外大联通中具有更强的跨国性、公共性与外溢性,威胁具有多样性和交织性,呈现地区化和国际化趋势。这就要求大边防不仅是防卫、管理,还要有合作和建设。大边防需要军事、政治、外交更有力和密切结合起来,积极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推动安全合作保障机制建设、沟通协调与合作机制、展开有力的公共外交,并且要求有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安全性。

总之,“一带一路”下的大边防是内外的连接点,是国家力量和智慧的投射点,是硬边防和软边防的结合部。大边防在理念和能力上要跟上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和节奏,成为“一带一路”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也必须在消除“中国威胁论”、打造“命运共同体”、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上做出新的贡献。

## 二、外向大进取性与大边防的新定位、新作用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精辟地分析过大国与小国的不同,他极具洞见地指出:“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命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和痛苦。”今天,中国要破除“强必然霸”的迷梦,走向自身。“一带一路”的提出,既是续走2000多年前的历史丝绸之路,又是开

拓新世纪的合作共赢之路。

在全球化和“一带一路”战略外向大进取性作用下，“边防”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线式边防，而是跳出“守卫边界”“国境警卫”成为“大边防”。大边防不再仅仅是一点一线的守卫，不再仅仅是兵戎相见，在观念、空间、方式上都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 （一）“一带一路”的外向大进取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古代丝绸之路衰落数百年之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正重新勾勒亚洲和欧洲合作的新图景。这个图景是外向进取、开放合作的。

闭关锁国曾使得亚洲文明中心的大国中国蛰伏在自我包裹的厚茧中与世界隔绝，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大陆文明、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海上行动后归于沉寂，把海洋和世界让给了不断进取的西方列强，最后连生存的权力也几乎被剥夺。可见，封闭是一种不自信的自我保护，这种自我保护无异于作茧自缚。

17世纪，弹丸小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曾经垄断了全球贸易的一半，连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贸易也完全掌握在荷兰人手里。荷兰把外向经济看作国家发展的生命线，这样的观念，使得偏居一隅的小国成为叱咤半壁世界的“海上马车夫”。英国如果把视野和力量一直拘泥和纠缠于欧洲，那么它就无法从一个岛国成为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正是因为跳出欧洲，走出新航线，创造了新思想和新技术，英国才在19世纪遥遥领先。19世纪末，虽然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扩大贸易的能量在不断积累，但是整个社会并没有向外发展的强烈意识和建立全球力量的冲动，坚守光荣的“孤立主义”和内向型发展是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共识。马汉海权论的出现，影响了西奥多·罗斯福等政治家、外交家，海权论思想将美国的眼光拉离了北美大陆，沿着海洋伸展到全球，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才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专注内向型国家转变为外向型和进取型国家。从此，美国开始从北美洲走向全世界。

有人对“一带一路”作了很好的描述：“东牵亚

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连接欧亚，辐射40多个国家，覆盖30多亿人口。”这个战略是典型的“走出去”发展的国家战略，体现的是积极性、进取性、外向性。

#### （二）外向型边海防要突破传统

从某种角度说，观念就是力量。改变观念就是扭转方向，就是找准新的着力点。贯彻落实这个外向大进取战略，边海防务也必须校准指向，建立并发展外向进取型的大边防大海防。

中国传统边海防是典型的内向型，从文化影响力上由内向外递减，国家安全观为“天子守四夷”，边疆是中央的包裹，是维护中心安全的屏障。中国对海洋的认知经过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经历四个阶段的观念变化。第一个阶段，把海洋问题看成陆地安全问题，海洋只是陆地的屏障，这个观念遮蔽了中国上千年；第二个阶段，将海洋问题仅仅看成海岸防卫问题，鸦片战争中的守口防岸就是表现；第三个阶段，把海洋问题看成是近海防卫问题，看不到真正的大洋，甲午战争之惨败是其体现；第四个阶段，以跨海入洋的眼界进行思考，终把海防和走向世界联系在一起。

当前，边海防形势发生重要变化，边海防转型任务自然凸显。边疆虽然是国家主权的空间防线，但应该成为国家利益对外拓展的出发基地，成为内外结合维护国家安全的前进阵地。作为出发基地，支撑国家利益向周边地区、远海进行外向发展，连接边疆发展带与周边发展带，沿海发展带与四海两洋（西北太平洋和北印度洋）发展带；作为前进阵地，成为外向前推安全前沿的强力支撑，以更大的外向性战略纵深，形成边疆地区的沿海经济腹地的安全掩护圈。传统的边海防是防御性的，拒止外敌入侵，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新形势下，边海防要在强化其防御功能的基础上，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将防御提升拓展为防卫，注意从源头消除威胁，特别是消除恐暴势力、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的源头；要将战略自卫与战术进攻有机结合，实现有条件的先发制人；要前

伸防卫,使侵略者在边防一线受到惩罚。

### (三)以“和合”思想为主轴的外向大进取性

纵观世界史,以往外向型国家的进取都是以战争为开路先锋、以坚船利炮为手段:在人类交流活动中,常常是以武力为推进力;世界文化的交流中,贯穿着多少以强凌弱的血泪。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亲仁善邻、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也是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的历史根基。历史走到今天,到了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真正承担起复兴世界上最悠久的华夏文明责任的时刻。其中的责任自然也包含用“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精神为世界承担责任。如今,中国仍然坚持以近邻周边为基础,没有像近代西方国家那样在世界范围建立殖民地,拓展势力范围。“一带一路”战略则是“和合”思想的实践和升华,是人类文明史的进步。

“一带一路”的“和合”,是在地域上立足亚洲,从中国向中亚、东亚、南亚、北非以及中东欧方向辐射,以欧亚大陆为合作平台;在合作伙伴上,以沿线国家为主要对象,又不限于此,而是欢迎任何有意愿而真诚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在合作模式上,本着平等、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原则,共同制订时间表、路线图,一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王毅外长形象地说,“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国共同参与的“交响乐”。

国无防不立。“一带一路”的政策越开放,大边防的防卫就越是重大的战略问题,就越需要建立可靠的战略拓展基础平台。要想“走出去”,边海防体系的安全是重要的支撑,支撑越牢固,我们就会走得越稳,走得越远。大国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和痛苦,大国边防的责任和价值同样也在于此。

## 三、“一带一路”与陆海结合

中国位于欧亚板块东部和太平洋板块西部交汇的沿海陆地,陆海兼备的地缘特征突出。历史上,

中国绝大多数时期的国家取向都是“向陆背海”,极少数时候是被动走向海洋,不仅无法发挥海陆兼备的地缘优势,反而常常陷入陆海两线受困和内部分裂。中国在战略上需要消解海、陆二分的现实,而选择全方位的陆海统筹。当今,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最大变量,招致西方的误解、敌视和海陆的包围、遏制。“一带一路”构想将“两个丝路”即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整合起来,使丝路发展第一次跳出古丝路的地缘局限和海、陆各自不相属的旧棋盘,绘制了海陆兼通的蓝图。这就迫切需要强化陆海统筹观念,拓展陆海统筹内涵,整合陆海两个战略方向、两种资源、两种文化,以形成优势互补的边海防整体实力,形成陆海联动、陆海策应的态势。

### (一)统筹对陆对海两个战略方向

中国作为陆海兼备的国家,如何处理陆地与海洋两个方向的关系,是中国制定战略的重中之重。统筹陆海,首先就是统筹这两个战略方向,关键在于避免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近600年来,中国一直无法摆脱两难选择的制约和困扰。19世纪70年代,清王朝同时面对沙俄和日本陆海强邻威胁时,采取了陆海并重的战略,以当时的国力根本无法完成,最终国家崩溃。20世纪60年代,中国同时面对来自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陆海的威胁,采取的“两条线”“两面开弓”的战略虽然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及时调整战略,实施“一条线”对策,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最终避免了晚清的地缘政治悲剧。

历史表明,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很难长期保持双料强国,战略集中是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取胜的前提。实行陆海兼顾战略并不是海、陆两个方向平均使用力量,而是在兼顾中有重点。根据中国陆上和海上安全局势的实际情况,中国当前的战略重心应转向海洋。正像吉原恒淑和詹姆斯·霍姆斯在《红星照耀太平洋》中所说的,“中国发现自己在不同方

向存在大陆和海洋”，“中国的活动范围也将日益扩大到远离中国沿岸的海域”。他们把中国转向海洋称为“非凡行为”，“就连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也会向这种动员国家资源的能力与决心致敬”。

### （二）统筹用陆用海两种资源支撑

海洋和陆地作为两种不同的空间，二者之间存在复杂的物质能量和空间能量的交换过程。古代丝绸之路虽然促进了陆上的大繁荣，但海上优势迟迟得不到展现，使得中国落后于大航海时代，闭关锁国，导致近代遭受西方世界的欺凌压迫。历史证明，只停留在认识和利用陆地资源的阶段，是无法满足一个陆海兼备国家的发展的。中国逐渐确立海洋大国的发展方向，也逐步在认识、发掘、利用海上资源。这里的“海上资源”不仅是指海底的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而且也指战略意义上的空间资源。统筹用陆用海两种资源支撑，是将相对孤立的海陆系统整合为一个新的整体，既有一定的陆地空间可以周旋，又有海洋屏障和海洋通道可资利用。

对海上通道和陆地通道的整体筹划就能完成两种资源的支撑。海上通道本身是一种资源，但存在较大风险，开辟陆上的通道，则能化解、分散、降低这种风险，缓解“马六甲困局”。陆上通道为：一条和缅甸接壤，是从昆明一直延伸到缅甸的沿海港口；一条中巴公路，一直通到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待2017年瓜港竣工，可从中国遥远的西部直达阿拉伯海与阿曼湾、波斯湾，直抵苏伊士运河；一条通过孟加拉的港口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后形成印度洋陆海通道。

天堑变通途，海陆的阻隔终归会消失。“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繁华会让中国和世界受益。

### （三）统筹缘陆缘海两种文化创新

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两大文化体系——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之间相互冲突的历史，这种冲突甚至造成了国家的衰落和分裂。中华文化主体是中部的养成、坚韧的大陆文明，与东部的开放、重商的海洋文

明有着很大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蛰伏于大陆、畏惧于海洋的文化。正如王义桅所说“中国文明中不乏海洋基因，只是长期被大陆基因所抑制”。从某种角度看，战略是文化先行，海防建设是两种文化的交锋、交融地带，应该充分利用两种文化和两种思维的优势。统筹缘陆缘海两种文化创新，是对时代精神的打造、对民族性格的重塑、对新质文明的创造。

自古以来，中国大陆文化以古代都城为中心地带，以黄河为中心向外辐射到整个东亚地区，形成了中华文化圈。重海防还是重塞防，走向海洋还是选择西进，长期困扰着中央政府。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以瑗瑛一腾冲为界，把中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半壁，被称为“胡焕庸线”。“胡焕庸线”是中国东西差距、陆海隔绝的表现，这种隔绝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和观念上的。“一带一路”突破了内部“胡焕庸线”和外部陆海隔绝的战略，明确了中国同时从陆上和海上“走出去”，既发挥传统大陆文明优势，又推动海洋文明发展，使中国陆、海文明协调并进，真正成为陆海文明兼备的国家。

当前的文化融合，更多的是指从世界吸收先进的海洋文化，给传统的大陆文明输入海洋文明的特质。中国海洋文化向陆地的传播要以点和轴带动：点是沿海港口城市，轴的一个方向是环渤海地区5800公里的海岸线，另一个方向是从各沿海港口向内陆延伸的交通线。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在今天要交汇并重新塑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国陆地幅员广大，面向西北太平洋，又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作为欧亚大陆东部的主体性国家，注定应当走向海洋，让海风吹来，春暖花开。

法国数学家、思想家巴斯卡有一句名言：“前进的事业必须被前进所取代。”拥有巨大创造力的伟大的中华民族一旦开始“再出发”，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进步。👉

（责任编辑：何 荷）